

# 重新定义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

在全球化的今天,文学的现实关怀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界的关注。近日,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“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”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,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。本文试图梳理论坛学者的观点,从百年来的具体作家作品出发,从对现实的关怀、对作家的关怀等角度,展望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未来道路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白雁

## 文学的核心被技术性的东西遮盖了

中国新文学肇始于百年前作家们对现实的强烈关怀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演变,作家的现实关怀也表现出变动不居的嬗变过程。无论如何变化,文学与现实的关系,历来是评论家们关注的核心。

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认为:如果说文学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存在本质的勘探,那么文学的现实关怀就是对于人的具体存在方式的关注;如果说文学的历史感体现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命运,那么文学的现实感表现的就是对于人的现实境遇的探索。在他看来,更为重要的是,文学的终极关怀离不开现实关怀的基础,文学的历史感也必然以现实感为根基。

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锡章从中国文学的传统,来溯源文学的现实关怀。他认为,中国文学有着优良的关注现实的传统,早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开始,就是从人、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关注现实。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从“五四”时期新旧文学交锋的角度,指出了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复杂关系。何锡章教授表示,近三十年,随着对技术性的追求,文学创作发生了变化,文学的核心——对于人的关怀、人道的关怀,某种程度上被遮盖了。以先锋派为例,它的探索在形式上是有价值的,但是在人性关怀上是有所退步的。何锡章提出,当下,对于文学来说,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关注,即继承传统、回归文学自身的价值性存在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赞同何锡章的观点,他认为,文学的现实关怀涉及两个领域,即作家对人物的关怀,以及研究者对于作家怎么保持现实关怀。关于后者,程光炜以他个人研究视域中的路遥和王蒙为案例做了解读。

## 回到作家的心灵史,厘清路遥“兄弟失和”公案

围绕着著名作家路遥,有一段广为流传的“兄弟失和”公案。这一段公案,在诸多与路遥有关的纪实作品中都有记载。在路遥的亲人中,四弟王天乐受到他的格外照顾。正是在路遥的照顾下,他这位有着一些文学才华的弟弟得以摆脱农民身份,被招为工人,后来,还是在路遥的帮助下,王天乐成了一名从事文字工作的记者。然而,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,路遥去世前病重住院期间,与他关系亲近的王天乐很长时间里缺席。普遍认为,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四弟王天乐“背叛”了路遥,背着路遥在外面借钱,并多次在外人面前对路遥出言不恭。这让路遥怒不可遏,甚至在病床上宣布与四弟断绝关系。

路遥去世后不久,王天乐也因病去世。王天乐生前,对“兄弟失和”曾有回应,但他的回应与其他人的说法有矛盾之处,因此往往被忽略。路遥“兄弟失和”令人联想到著名的周氏兄弟失和,实际上,这种表面上的“家务事”,不仅关系到作家的文学

形象,也关系到他与此事件有关的文学言论的真伪,而后者往往被用来作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材料。

这样的材料准确吗,可靠吗?程光炜追问“兄弟失和”背后的原因——四弟王天乐之所以不来照顾路遥,原因真的是如此不堪吗?他得到的最新的一份路遥亲人的访谈录显示,其实四弟王天乐生前也罹患肝癌,所以他拜托五弟去照顾哥哥路遥。也因此,路遥去世前,陪伴在他身边的亲人,是他的五弟王天笑。

程光炜另举作家王蒙为例,他关注作家或明或暗的心灵徘徊期,认为这对作家的创作有极其重要的影响。也因此,“立足于当代文学,除了回应文学作品外,还应该回到作家的心灵史。”

## “离乡者”与“还乡者”的两种书写

作为一种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生活碰撞的产物,“打工文学”与社会发展现实密切相关,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,甚至被视为新世纪文学的一道风景。但是近十几年来,打工文学却陷入沉寂,很多作家创作停滞,也有的开始回归故乡、田园,以创作回忆类作品为主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,从文学关怀现实的角度出发,呼唤打工文学的蜕变与新生。

贺仲明分析,造成打工文学沉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有一些创作者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,生活发生了变化,与打工生活产生了隔阂;一些熟悉打工生活的作者,却缺乏创作的能力,不知道怎么写,或者他们的创作没有像上一辈那样,产生那么强的社会影响力。他同时也认为,当前的社会环境并不只是对打工文学的发展不利,其中也蕴含着这类作品深化发展的契机。从社会群体来说,打工者这一群体依然大规模存在,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越来越长,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,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——如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等,他们的生活值得关注。从作家方面来说,这些拥有丰富的打工者独特生活经验、也有较深情感的作家群体,不应该放弃已有的创作资源,值得在创作中继续开拓和深化。

贺仲明站在评论家的角度,努力探索如何保持打工者创作的持续性、如何加深打工写作的真实性,以期他们借自己的独特生活和文化优势,开拓出城市书写新的空间,展示出城市书写新的可能性。

与贺仲明形成对比,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毕光明关注的是“还乡者”的关切与悲悯。他通过莫言“故乡人物志”中的《等待摩西》,展开探讨。2017年之后,莫言重新开始发表作品,他的一组“故乡人物志”,从记忆中调取高密东北乡的奇人轶事,这些小人物的身上,留着历史纷纭与人性合力雕刻的痕迹,每个故事都透着沧桑感。毕光明透过莫言对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书写,肯定其对于东北乡人物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深层关怀。就《等待摩西》而言,毕光明认为小说重点指涉了革命、经济改革、社会制度建构与完善过程中的多重现实问题,批判了城乡二元体制给东北乡人带来的深重苦难。



王彬彬



张光芒



何锡章



程光炜



贺仲明



刘俊



毕光明



方维保



周志雄



陈进武

## 观点

### 抵达文学关怀的现实路径

文学关注现实,有赖于对文本本身的构建。如何通过文本的构建,抵达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?

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俊从宏观角度对“现实关怀”与“文学表现”的关系进行辨析,他提出文学学科对社会学关于“现实关怀”的定义进行扩充和生发,即以“文学表现”表达“现实关怀”增添了其丰富性和可能性。刘俊认为,应当考察不同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处理“现实关怀”时的多元姿态,他选取陈映真这一具体案例,从作家立场、叙事姿态、美学呈现等方面考察其创作,指认其包含底层左翼的“现实关怀”和先锋现代“文学表现”的特异组合,打破了用现实主义表达“现实关怀”的认知惯性,并鼓励“文学表现”与“现实关怀”的多样化组合涌现。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保关注“非虚构”写作。方维保沿着报告文学——纪实文学——非虚构的脉络,解读“非虚构”创作近年来日益强势的理由。他认为,在“典型化”文学时期,报告文学契合了时代的需求,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出现一种解构思潮,纪实文学逐渐凸显,与报告文学共存,甚至覆盖前者。其原因是,它的社会学性质越来越浓厚,文学性下降,甚至受到政治和商业的影响,风靡一时的商业纪实即是证明。“报告文学”和“纪实文学”是从正面命名,而“非虚构”则是反面命名,即不准虚构,是对真实性的强调。贯穿这一长串发展脉络的是文学的虚构和想象,以及它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抵达,两者间的一种紧张关系。他提倡,应该建构一种伦理,在纪实和虚构之间建构相对稳定的关系,表达现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。

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雄关注网络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处理,他借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“网络女性主义”的说法,创造“网络现实主义”的新概念,并从书写内容、创作环境、读者期待等角度进行阐释。周志雄指认网络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具有双重性:一方面其窄化了现实生活,注重书写积极面,过滤掉现实的其他面向;另一方面其故事形态的非真实背后是情绪的真实,迎合读者的阅读感受,引起共鸣。周志雄认为网络现实主义从文学观念、社会意义、创作风格等角度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,亟需新的文学理论和评价体系推动网络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。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陈进武穿透选出的新概念、新思想、新审美取向等重重迷障,对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方向进行整体把握。他指出,“现实主义”概念的变化,映射着当代文艺的发展与转型。其中,概念的延伸、观念的嬗变、审美的新变等,都是需要去探求的问题,同时也是理解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。由此,他从“现实主义”传统出发来反思当下文艺创作写“现实”的问题,并进而提出三点思考:其一,概念边界的“模糊化”;其二,内容书写的“滤镜化”;其三,审美取向的“含混化”。

(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徐璐、王文君、张鑫对本文的支持)